

国家“十五”重点图书

从乡村工业化到城市化

——浙江现代化的过程、特征与动力

“浙江模式”实证研究丛书

王自亮 钱雪亚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国家“十五”重点图书

从乡村工业化到城市化

——浙江现代化的过程、特征与动力

“浙江模式”实证研究丛书

王自亮 钱雪亚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乡村工业化到城市化:浙江现代化的过程、特征与动力 / 王自亮,钱雪亚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3.8

(“浙江模式”实证研究丛书)

ISBN 7-308-03380-5

I. 从... II. ①王...②钱... III. 农村—工业化—研究—浙江省 IV. F12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3671 号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浙大路 38 号 邮政编码 310027)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丛书策划 袁亚春

责任编辑 袁亚春 胡 宁

封面设计 刘依群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125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书 号 ISBN 7-308-03380-5/F·451

定 价 29.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环境与现代化的人文动因	(1)
一、发展环境和经济生活特征	(2)
二、人口流动与财富积累方式	(12)
三、观念的土壤:功利主义与务实传统	(21)
第二章 乡村工业的崛起与经济增长	(25)
一、背景: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社会状况	(25)
二、轨迹:经济伴随乡村工业的崛起而增长	(29)
三、乡村工业化的基本特征	(38)
四、转折点的临界分析	(44)
五、乡村工业化模式的创新	(50)
第三章 经济增长的市场环境	(58)
一、传统乡村工业崛起的市场背景	(58)
二、乡村工业化进程中的市场优势	(63)
三、现实考验: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	(71)
四、需求约束环境下的市场竞争力	(77)
第四章 产业优势及其竞争力	(91)
一、产业优势的基本内涵	(91)
二、产业优势的度量体系	(96)
三、浙江产业优势及其竞争力实证分析	(106)
四、提高浙江产业竞争力的基本路径	(123)
第五章 支持系统:制度条件	(129)
一、乡村工业化的宏观体制背景	(129)
二、乡村工业化的微观制度优势	(137)
三、新的制度背景下的创新要求	(143)
第六章 支持系统:金融和技术	(152)
一、金融支持的推动作用和实现途径	(152)
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途径和绩效	(159)

三、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	(163)
第七章 支持系统:人力资本	(174)
一、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	(174)
二、乡村工业发展之初的人力资本背景	(179)
三、农村从业者人力资本积累的现状	
——各类农村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及其差异	(181)
四、人力资本贡献的实证评价	
——相对高文化从业者的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力	(187)
五、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与全省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分析	
——农村从业人员文化素质偏低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193)
六、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中教育的收益率研究	
——农村从业者受教育水平低的原因探究	(202)
七、优化浙江人力资本要素对策	(209)
第八章 城市化的动力因素	(216)
一、城市及其经济效应	(216)
二、城市化与经济互动的关系研究	(218)
三、浙江城市化水平评价	(224)
四、浙江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城市化	(240)
第九章 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	(246)
一、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过程	(246)
二、如何配置与整合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	(251)
三、存在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257)
第十章 决策过程与政府行为	(262)
主要参考文献	(279)
后 记	(285)

第一章 社会环境与现代化的人文动因

对繁荣与活力的向往,对增进社会福祉的要求,以及对个性自由和效率的追求,这些因素构成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动力。然而我们作进一步的探寻,就会惊讶地发现,除了上述这些直接驱动力之外,还存在着包括现实社会环境和思想文化在内的更深层次的诱因。这种现代化的“人文动因”,有时表现为特定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有时可归结为某些社会风尚和生活习俗,还有杰出人物的思想和行动。这些因素固然不易作数量分析,但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

在开头一章里,我们将深入考察浙江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渊源,分析这个区域现代化过程中包括人文因素等组成的动力结构,阐述社会与经济、观念与财富、传统与现实的互动关系,重点描述浙江人的经济生活特征,人口流动和财富积累的方式,同时剖析浙江思想家所孕育的经商观念与事功意识,流行于这一地区的“义利并存”、“工商皆本”的思想遗产,现代国际大都会上海崛起对浙江的影响,以及通商口岸引发的外来文化传播情况。

值得指出的是,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处于沿海开放地带的浙江是中国社会经济变化最为剧烈、最引人注目的区域之一。浙江发展过程中所显现出的发轫于乡村工业化,最终走向城市化的现代化轨迹,特别是最近 20 多年来资本积累与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新型社会经济组织的生长,正好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缩影。无论把目光放在长时段还是短时期,以何种方法观察这一区域各种事物和思想的碰撞,只要我们找到一个便于观察的视角与基点,并且作出独立的思考和分析判断,就能藉此进一步认识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人们行为意识的变化,从而使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历史趋势和时代脉搏。

一、发展环境 and 经济生活特征

(一)沿海环境和浙江人的海洋意识

打开任何一幅世界航海地图,都可以看到,中国标有“浙江”字样的那块只有 10 余万平方公里的地貌复杂的陆地,因面临世界上最大的洋面——太平洋而格外耀眼。22 万平方公里的浅海陆架是这个省份大陆面积的 2 倍,而曲折漫长的海岸线(包括岛屿岸线)长达 6486 公里,岛屿占了全国总数的 40%;陆地面积大于 500 平方米的岛屿有 3061 个。作为浙江人,从懂事开始,“东海”就以它不驯和浩森的形象出现在眼前,并融入日常的言谈之中。年纪稍大一些的中国人几乎都还记得地理书上的介绍:中国最大的渔场在浙江舟山;而年轻的一代也有不少人说得东海油气田。

略呈扇形的东海,浅海大陆架处于寒暖洋流交会地带,加上长江、钱塘江、甬江、闽江等若干条著名江河的注入,适宜于浮游生物和鱼类栖息、索饵、洄游和繁殖,它的丰饶是显而易见的。同古老的农业一样,以出海捕鱼、滩涂养殖为主要特征的渔业,成了浙江人的主业之一。世代以来,这里就休养生息着无数的沿海居民和行踪不定的渔业迁徙者。许多人出海之后,不幸葬身于鱼腹,舟山渔村就流行过一种叫“潮魂”的特殊丧葬风俗。当然,有更多的人们在这片海域和滩涂找到了满意的归宿。海洋,不仅是浙江人的一种基本的生活资源,而且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要素。

这是一个良港众多、宜于舟楫的地区:在海图上,这一带海岸标满了锚地的记号,交织着航行的路径。因东海恰好地处中国东部沿海的中点,与黄海、南海为邻,浙江自然成为南北沿海和海外交通的重要通道。历史上,宁波是“海上陶瓷之路、丝绸之路、佛教之路”的起始港,温州是一个重要的商港,而舟山自古以来即为著名的海洋渔业基地。现在,置身于浙江的那些沿海港口,到处可以感受到它们强有力的搏动:集装箱、吊塔和穿梭的巨轮,39 个万吨级以上的泊位,近 200 万吨规模的海运船队,2.1 亿吨的港口年货物吞吐量。

至于海边的风光景物,也颇能影响人的性情与胸怀,在浙江绵长的海

岸线和广阔的海域里,有着气势磅礴的大海,桅帆林立的港湾,岸险浪急的礁石,宽阔洁净的沙滩,幽静庄严的庙宇,奇特罕见的海洋生物,无不时时给人们以一种开阔视野、提升心智的暗示与熏陶。不仅如此,浙江沿海的许多人情风俗也与内地或邻近沿海地区迥异。始于春秋战国的“钱江弄潮”习俗就是相当有力的证据。弄潮向来是挑战者的行当,勇敢者的游戏。吴自牧在《梦粱录》卷四《观潮》中这样写道:“其杭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满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观潮》也说:“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

黑格尔在《历史研究》中研究了人类历史的地理基础的差异。他把人类生存的环境分为高地、平原和海岸区域三大部分,讲到海洋时,他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① 黑格尔指出了生活在海洋区域的人们的特性:勇敢、机智,为追求利益敢于冒险。尽管黑格尔全盘否定了亚洲民族的海洋精神,但是,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深入考察,就不难发现,海洋对于沿海区域的人们影响是巨大的。人的环境并不能完全决定人,但环境的确无时无刻地影响着人。作为上述这样一种自然状况和生存环境,决定了浙江人有着强烈的海洋意识。

生活在浙江沿海的密集人口,有着高度的流动性。温州和台州沿海渔民有相当一部分自福建等地沿海移民而来,在那一带的某个小镇或村落里,就可以听到人们同时操闽南话和各种当地方言,一个人可以在顷刻之间说上三至四种方言,转换之快,令人诧异。玉环、温岭等地流行的“大奏鼓”这样一类节奏强烈、诙谐风趣,还带上一点怪异的巫术色彩和渔事特点的民间娱乐节目,显然是从闽南一带随着沿海移民的定居而演变、扎根的。从舟山近 10 万渔民的祖籍来看,几乎所有渔民都由大陆迁徙而来。流动和居住环境的变更对于浙江沿海的人们来说,已成为一种生活常态。这便解释了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浙江经商务工者的踪迹为何能遍

^①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6~97 页。

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为了生存的需要,那里的青壮年劳动力既出海捕鱼,又翻晒海盐,还从事滩涂养殖,一部分头脑精明的人们去做生意或兴办企业,老弱者则从事冷藏加工或织网晒鱼,这是一幅典型的“渔区忙碌图”。如今象山一带的“开渔节”虽然已经带上一定的招商和吸引旅游的意味,但它毕竟是一种渔民投入渔汛紧张劳作的生动仪式,折射出浙江沿海民众的勤劳与坚韧。

同样,冒险精神和贸易意识也在这种沿海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环境里自然地孕育出来了,南宋以降经济重心南移之后更为突出。近代以来,在现代化要求和外来文化的交互作用下,这种冒险、有为和开拓精神,强烈的对外贸易意识逐渐定型。“事欲工必先利其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地处沿海的浙江,其人群的主体,既不是荏弱的饱学无用之徒,亦非一群整日海边聚啸、无所用心之辈。浙江人不仅历来就有相当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而且非常善于从事海外贸易。从某种意义上说,浙江人非常浓厚的海洋意识是与“事功”精神结合得十分紧密的。让我们在这里稍作列举:

造船。虽然有关瓯越祖先很早就会制造独木舟(所谓“剡木为舟”)的记载语焉不详,但近期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完整的陶舟和6支木桨,以及一只中间挖空、横断面呈弧形、一端收敛的尖圆形的独木舟残骸,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样,浙江沿海的造船史可追溯到六七千年前。古越人在春秋晚期开始制造木板船,在钱塘江南岸设有造船工场,所造船只种类有楼船、戈船、翼船等。越王勾践也说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说明那时造船业就有了相当的规模。有学者认为浙江东南一带“实为中国造船与航海之发轫地也”^①。越国一次可以派遣水兵2800人乘船直达山东半岛南部,航海如履平地,没有大海船显然不可能。

秦汉时期越人继续造船。汉朝的中央政府在浙江会稽郡“治楼船”。当时的海舶,“大者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尺,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有的远航大船悬挂七帆,乘风破浪,很是壮观。六朝时浙江造船中心在温州、台州地区。现平阳以东的横屿船屯曾为三国孙吴的造船中心。隋唐时,浙江是全国造船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官营、民营居然能齐头并进,蔚为大观。隋炀帝大业元年(605)曾经采木造龙舟、凤艫、黄

^① 参见陈依元《浙江海洋论纲》,《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十三卷第三期(2000年9月)。

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唐太宗为征高丽,一次就“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而当时这 12 州,半数在今浙江境内。明州(今宁波)商人李处人、张支信等甚至还赴日本造船,咸通三年(862)日本真如法亲王就是乘着张支信的船来大唐的。唐朝海船打造采用钉樁接合和多道水密隔舱结构,增强了横向强度和抗风浪、抗沉没的能力。由于船体结构坚固,帆桅亦相应增加,所以更适合远洋航行。

宋元时期是浙江造船业的繁荣时期。北宋曾在杭州、秀州、湖州、明州、台州、温州和婺州设立造船场,明州和温州以海船打造著称于世。宋徽宗宣和年间(公元 1119—1125 年),明州打造的神舟浮在海上“巍如山岳”,载重量 2 万斛以上,约合 1100 吨,以致神舟到达高丽时,出现了“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的壮观场面。南宋时仅温州就每年打造海船 340 艘,造船的技术非常成熟,“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船内有水密舱壁分隔舱室,并且以加压载法保持行船平稳,以“舟腹两旁缚大竹为囊”作为吃水线来控制载重量。

航海。宋代中国的航海技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出使高丽的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说:“若晦暝,则用指南浮针,以癸南北。”他的船已使用指南针来辨别航向。当然,当时航海主要还是靠天文导航,只有阴天不见星辰才用指南针辅助导航,指南浮针只是一种水浮单针,后来发展为指南针。徐兢的使船是在明州(今宁波)打造的,足以证明浙江是最早将指南针用于航海的地区之一。

浙江人特别善于开辟海上航线,从远古越人先民驾舟筏漂洋过海,开辟环东海、黄海圈地区的原始航路,到西周时浙东沿海于越人从南到北寻求东亚大陆架沿海岸航线,都表明了这一点。西汉的时候,浙江人从句章、东瓯、固陵等港口出发,开辟了经福建、广东沿海港口,到达印度支那各地的海上航线,并从那里经印度洋与地中海航线相接。到了唐朝,东海新航路的开辟和季风规律的掌握利用,对浙江开通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南海诸岛乃至大食国(阿拉伯帝国)海上远洋航线,以及海外贸易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条由浙江沿海经广州南向西行的远洋航线,已由印度半岛延长至波斯湾,全长达 1 万多公里。元代之后,浙江各港口的南洋西向航线不仅更加便捷,而且向西直达地中海沿岸各地和东非海岸各国。为了运输舶货,元世祖在至元二十六年(公元 1289 年)用行泉府所统领的海船自杭州至福建泉州设置了海站 15 所,每站配置海船 5 艘,水军 200 人,专运“番夷贡物”和商贩奇货。

海外贸易。唐代后期开始,浙东的明州港(今宁波港)成为对日交往

的主要港口,一个以明州商人为主、明州港为基地、日本为主要贸易对象国的明州商帮应运而生。据史书记载,他们往返明州与博多(今日本福岡县)间贸易共有30多次,从明州输出瓷器、药材、香料、丝织品等,而自日本输入砂金、水银、铜、硫磺、锡、刀剑、锦、绢等。北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明州商人陈亮与台州商人陈维绩等147人去高丽贸易,直到北宋末年的55年中,明州商人航行去高丽经商的有120多次,每次少则几人,多则百余人。此外,明州与东南亚、阿拉伯诸国也有贸易来往,波斯、阿拉伯商人也不断来明州经商,为此州府还在市舶司西边波斯商人集中的地方建造了波斯馆,波斯商人则在狮子桥北设立清真寺。元代浙江的海外通商更加兴旺,庆元(今宁波)作为全国三大外贸港口之一,基本包办了元朝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海外贸易。这时与南洋的贸易除东南亚、南亚之外,还拓展到西亚、非洲各国。^①

温州早在隋唐时期就开展了对日本的民间贸易,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温州曾首次被宋廷列为对外贸易口岸;南宋绍兴元年(1131)或稍前,温州设立“市舶司”,管理对海外贸易。温州与日本、高丽、真腊(柬埔寨)都有商船来往,主要出口贸易项目有木材、酒类以及漆器、瓷器、刺绣等工艺品。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或稍前,温州复设“市舶司”,继续对外贸易。^②

从通商货物看,浙江的海外贸易也是蔚为大观。尽管西汉及魏晋南北朝时出口的货物还局限在越布(葛布)、青瓷器、铜镜和丝织物上,但到五代十国时,这一份“清单”就大大地扩展了。当时,浙江输出的主要商品,有越窑青瓷、丝绸织物、佛教经典、法器、工艺品、药材等,进口的货物有砂金、水银、锡、木材、棉、绢、良马、参药、香药、犀角、象牙、苏木、珠宝、龙脑、玳瑁、水晶及火油等,《吴越备史》上说:“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还应用于火攻战役。吴越国“航海所入,岁贡百万”。可见其海外通商之盛,获利之巨。两宋时期,浙江的进出口商品达160种。北宋时,从高丽进口的商品多达40余种。元代浙江进出口商品达220多种。近年来,在埃及、肯尼亚、坦桑尼亚、阿拉伯、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都有宋元时期的浙江越窑青瓷、龙泉青瓷出土。

^① 陈依元:《浙江海洋论纲》,《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十三卷第三期(2000年9月)。

^② 《温州市志》,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39页。

(二) 亚热带气候和精耕细作的稻作文化

气候与耕作制度对一个地区的社会生活及经济特征的影响甚为深远。不仅植被、作物与气温、雨量有关,而且气候对人口分布状况、迁徙方式,甚至特定人群的精神面貌也会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耕作制度则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地区人们的生存方式,对社会生活也有着制约和影响。前工业社会对这两大自然人文条件的依赖性更强一些。我们通常说的“南北差异”,就包含了气候、耕作和习性的不同,这些都与生产流通方式直接相关。亚热带季风气候和精耕细作的稻作文化,对于浙江经济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

浙江全省年平均气温 $15\sim 18^{\circ}\text{C}$, 高于或等于 10°C 的年积温 $5\,000\sim 5\,600^{\circ}\text{C}$, 80% 保证率值 $4\,700\sim 5\,600$, 无霜期 $230\sim 275$ 天。这样的热量条件,能够满足连作稻和部分亚热带经济林木生长发育的生理需求。在光照、热量和水分的配合上有“雨热同步、光温互补”的气候优势,每年入春之后,随着气候转暖,三四月份出现春雨,五六月份又进入梅雨期,常年春雨、梅雨量 $500\sim 1000$ 毫升,这种气候现象对于各种春播作物,尤其是喜温、喜湿的早稻和各种利用茎叶的植物生长,都十分有利。春末夏初丰沛的降雨量,还为七八月份的干旱积蓄了灌溉水源,使晚秋作物和经济特产能充分利用夏秋季的光、热资源而获得高产。“光温互补”的气候优势,突出地反映在冬季,各种越冬作物仍然能继续生长,光能利用时间比北方长。当然,由于全省地跨四个纬度,浙南与浙北在热量条件上具有明显的地带性差异。

浙江是一个典型的精耕细作、高复种指数的地区。悠久的种植业开发历史,加上长期以来驯化和精心培育的众多农作物,特别是多种形式的轮作复种耕作制度,构成了浙江农耕社会的基础条件。据对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稻谷考证,浙江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种植历史已有 7000 年之久,是世界上已知种植栽培水稻最早的地区之一。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它表明中国耕作制度和农业文明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源头,稻作文化早已在浙江扎根,连同来自北方的麦植文化的影响,形成浙江多种农作物和特定的耕作方式兼收并蓄的局面。《越绝书》上就提及距今 2400 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浙江已有稻谷、麦、大豆、黍、稷、赤豆、裸大麦等 7 种粮食作物种植。

法国汉学巨擘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其通史性名著《中国社会史》中指出,“水浇稻田的耕作”取得了一种非常广泛的成功,发展到了可以灌

溉的所有温暖和潮湿的地区。“水稻种植业的发展在东亚人口史上代表着一个新的阶段,它从公元8~10世纪起为世界这部分地区的文化输入了新的生命力”,“与特有的生活方式相联系”。^①可见,浙江处于稻作文化圈内的耕作环境对今后的社会经济和生活方式是具有深刻影响的。

具体说来,这种“特有的生活方式”主要包括两层意思。其一,人们常年忙碌,没有连续或固定休息的观念。水稻这种作物,是需要精耕细作、悉心照料的,从播种到收获,加上轮作,一年到头有事干,不像在北方,冬天有两三个月可以蹲在热炕上唠嗑。也许,唠嗑的生活提高了北方人的语言能力,而常年的劳作却造就了浙江人的实干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格。除了自然条件不许可,如下雨刮大风等,他们总是忙碌在田头野外,这种吃苦耐劳的习惯,世所罕见。实际上,在中国不少地区,人们都是这样过日子的,只是在浙江民众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二,干活有着极强的时效性。上述农业种植结构,直接造成了这么一种结果:虽然是长期有活可干,但是受气候四季温差明显的影响,今天可干的事,两三天后便不能干了,这就形成了人们极强的时间观念,培养了他们及时、精细的管理意识。特别是“双抢”期间,要求时间有效地分配,用餐、休息和睡眠都需要合理安排,家中劳力的分工合作也显得特别重要,合理安排所有成员的工作、休息成为重要事项。这些都表现了上述耕作方式和自然气候对于人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对于现代经济发展仍有决定性的意义,普遍存在于浙江人身上的生活特性——勤勉、忍耐,善于经营,也与此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一年多熟的耕作制度也随之确立。据《太平县志》(今温岭市)记载,早在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年)已有间作稻栽培。明朝《农田余话》一书对此也有具体的叙述:“清明前下种,芒种蒔苗,一垄之间,稀行密蒔,先种其早者,旬日之后,复蒔晚苗于行间,俟立秋成熟,割去其禾,乃锄理培壅晚青,茂盛秀实,然后收其成熟也。”这种间作稻栽培方式,一直沿用至上个世纪50年代前期。1955年以后,通过各种改良,逐渐形成了目前以连作稻为主体的,冬季粮、油、肥作物复种轮作为基础的一年三熟或两熟的水田耕作制度。近十几年来,浙江耕地复种指数达240%左右,是全国最高的省份之一。加上江南肥沃的土质和相对完善的水利设施,有利于发展多种类、多品种、多熟制生产,同时适宜于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培育,为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原料的提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5页。

由于这种气候、作物和耕作制度的配合,浙江不惟“颇饶稻谷”,而且经济作物大盛,商品化程度历来很高。浙江的杭嘉湖一带唐宋以来就是天下粮仓,素有“苏杭熟,天下足”之说;至明清时,遂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谚,长江中游湖广地区取代了苏州和杭嘉湖地区的粮食生产、供给中心的地位。不过这也表明了粮食已更多地进入流通领域,并不完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明中叶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可以用货币代赋代役,使土地经营者和农民获得一些自由,有大量土地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如明清之际,湖州府出现了“田连阡陌,桑麻万顷”的景象。经济作物的种植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如桑蚕、棉花、麻、油料作物就为发展丝织业、棉织业提供了基础,另一类经济作物如茶叶、柑橘和竹木等作为商品直接投放市场,带来了市场的巨大繁荣,也为荒地的开发和人口迁徙创造了条件。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作物大量而普遍的种植,使有限的水土资源和劳动力得到重新调配,使资源发挥了潜在的作用。这就促使这些地方的经济发生重大变更,同时也孕育了市场经济的萌芽。^①

(三)兼职化的社会分工,市井社会与乡土生活的双重性

明清以来,丰富发达的农业经济,极大地促进了浙江的商业活动,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商人前来收购丝绸和棉纺织品,“各省直客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交换的频繁和交往的密切,使社会生活和区域经济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繁荣的商业城镇和新兴的工商业市镇大量出现,如杭州“为水陆之要冲,盖中外之走集,而百货所辏会”,商业十分发达。这就为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和手工业的发达创造了空间条件。^②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许多农村劳动力分离出来,进入市镇从事工商业或做兼业者。他们农忙时节回乡耕作,平时则出门从事五行八作,所谓的城乡地主也随之产生。冯贤亮博士认为,杭嘉湖一带“晚明到清代大规模密集农业的扩展,为人们谋生提供了较多的渠道,而且规模庞大的国内贸易以及由政府控制而利润极高的对外贸易与新兴的工业、手工业,也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③。他还指出,江南地区最具经济实力的,

^① 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 页。

^② 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 页。

^③ 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69 页。

是商人兼营部分行业的城乡地主,他们与代表着知识力量的缙绅们构成了社会中坚力量。

我们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浙江的一个沿海农村观察点——温岭市的新民村做了一个实地调查,发现那里的劳动力职业细分和阶层分化程度如此之高,村落社会结构如此“匀称”,在中国沿海地区也并不多见。这个村有社会管理者、企业主、煤炭经营户、经商者(个体或合伙)、运输户(船或车)、纯农、部分时间农(包括种养殖户)、受雇劳动者、无业者等 9 个阶层,500 多个劳动力从事十几个行当。村民们大都知道社会成员之间怎么合作,怎么捍卫既得的正当利益,人们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距离。兼职化的普遍性促使了农民对农业之外的营生格外关注。

在走访新民村的过程中,随处可以观察到发生在亲属、邻里之间的经济交往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变化,从交往方式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知晓什么样的合同是有效的、股份制企业的内部关系怎样处理为好、企业管理者的年薪与分红如何相对分离、调动资金的方式和幅度怎样才能做到使人接受、还款时除了清算本利之外还该以何种方式致谢、应收款的催讨技巧和时机应该如何掌握,等等。人际关系更是如此,例如在村民对村干部的敬意和羡慕中,除了乡村组织的“权力与声望”因素之外,主要还是冲着他们的能干和财富积累程度而来的。在安排家庭成员的分工时,许多从事经营的大户也充分考虑各人的所长,谁管家理财,谁出门采购,谁负责对外洽谈和交往,几乎都有周密的筹划和调遣。在这个并不十分起眼的沿海村落,居然可以找到一种能够详细分析伦理与人际关系对交易、企业、资源配置发生影响的典型社会环境,的确不是偶然的。

与这种经济格局和就业状况相伴随的是,浙江的许多地方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生活现象,那就是“市井社会”与“乡土生活”并存。近代以来,浙江一些商业兴盛的市镇,特别是浙北和浙东南一带的市场网络中心地,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那里,人们似乎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不少人一面从商、求艺、置业、交游,在某一非农行业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一面又保存着乡土的生活习惯,留存另一类的生活空间。在这里,追求经济利益与解决归属感、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被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了。

考察江浙一带的商人如何演变,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陈学文先生发现,这些商人一大部分来自手工业者,也有来自地主、富农、农民、士绅、

官吏。^①黄省曾说：“自刘氏毛氏创起利端，为鼓铸圉房，王氏借债，而大村名镇必张开百货之肆以榷管其利，而村镇之负担者俱困，由是雷产者百万。至今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求倍剋于齐民。”^②此为缙绅士夫经商的情形。归有光道：“虽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这些人一心经商，“富者溺于货利，而无暇于学问，……与（弘治）三十年前大不侔矣。”地主把财富转移到商业上，故江南地主不愿多置土地，喜欢“居货招商”。“今富人避赋役而不值产，并力求于市坊，以牟利四方者皆是。”^③这是因为明嘉靖后“一条鞭法”开始实施，商贾无田地者可以免去赋役，驱使商贾不复投资于土地，使商业资本开始脱离与土地相结合的传统道路，将资财转向商业，也有转向手工业的。^④不过，后来还是有相当的一批商人或手工业者保留着一点田产，既“力求于市坊”，过着一种市井生活，又不想完全割断与农村的血缘与宗亲的脐带。我们还可以看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离土不离乡”，以及城市化过程中诸如“进城”、“失地”等问题的出现，与这种经济社会格局和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有着深刻而有机的联系。

说到商业与工业的偏重，尽管江浙两省的经济生活特征有着相当多的相似性，但细分起来还是有不同之处。江苏是“工商并举，实业为重”，这一点在费孝通先生对其家乡苏南实业所进行的社会学实地考察可以看出来，以致江苏有了今天的许多品牌和大量的外资开发区；相比之下，浙江人的经济生活特征是“工商兼顾，倚重商业”，所以有了“宁波帮”、“温州人”的概念和“林家铺子”的形象。清末民初，大批浙江籍商人和金融家在上海脱颖而出，就是一个明证。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首先在全国形成影响的还是商业贸易特别是小商品市场，就是所谓“块状经济”的兴起，也与浙江各地拥有一支了不起的“供销员”大军，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营销网络密不可分。

① ② ③ 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④ 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二、人口流动与财富积累方式

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除了与特定的生态环境、劳动力素质和生活生产方式分不开之外,同人口流动和财富积累的方式、速度有着极大的关联。人口增长固然对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但人口流动的程度与速率,也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而财富的积累则制约着现代化的起点和过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的国度,又处于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情况下,社会财富的消长对现代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无论从历史的观点看,还是从现实状况出发,我们都可以发现,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的诸多因素之中,下列三个方面的情形是不容忽视的:两宋以来经济重心的南移,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人口的大量频繁流动;独特的财富积累方式和财富积累的程度;消费方式的形成和精致化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事实上,中国自两宋至今,经济重心一直在南移,只不过时缓时快而已,人口流动既与社会控制的程度有关,又与特定地区经济增长极的形成、吸引力的提高相适应,也与这一地区的人群对土地依恋的程度以及市场意识相联系。显然,浙江是一个特别适宜人口流动的地区。

财富的积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同作用,在最近的一系列研究中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掉了。许多人认为,经过分配上的平均化和一次次的大浩劫,我们的社会财富已经丧失殆尽,各个地区都在贫穷的起跑线上走向现代化。其实,社会财富的积累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对于浙江这样的地区来说,人们将物产转化为财富的本领,世代相传的技艺和经商的能力,在一定的时代气候和土壤条件下,可以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足以造成财富的快速积累。最近几十年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浙江人的财富积累方式在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从时间和速度上看,似乎浙江人特别能积累财富,其资本原始积累的步伐明显快于其他地区。